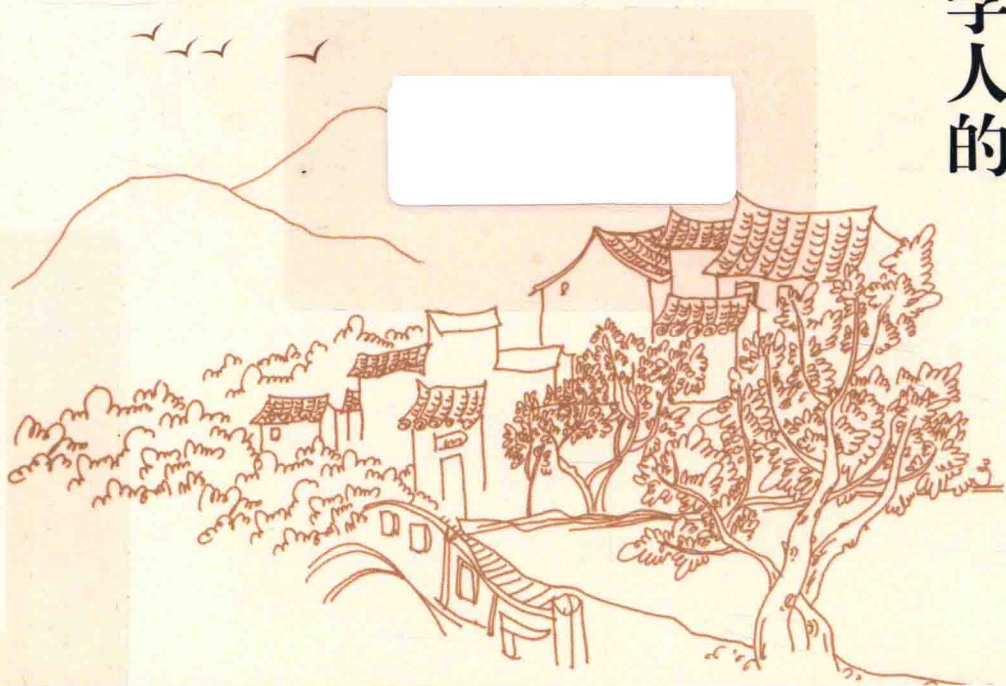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农科学人的

「三
农」
问寻

吴强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农科学人的

「三 农」 问寻

吴强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农科学人的“三农”问寻/吴强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1

ISBN 978-7-307-21047-9

I.中… II.吴… III.三农问题—研究—中国—近代 IV.F32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7070 号

责任编辑:陈 豪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9.5 字数:132千字 插页:1

版次: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1047-9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吴强博士的《中国近代农科学人的“三农”探寻》行将付梓，嘱我作序，这着实让我有些惶恐。因与他交往多年，谊兼师友，并且拥有一些类似的经历，也就乐于在这里拉杂几句。

吴强是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第一届学生，他入学时校园还是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没有后来的湖光柳影，校园周边基本上是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岭，不像如今车水马龙。当时图书馆大楼尚未启用，学生宿舍楼的一层就作为临时图书馆。吴强在这里度过了四年时光，一直是宿舍楼下图书馆的常客。之后他如愿考入武汉大学，攻读世界史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担任中学历史教师。从他处女作的后记中不难看出，吴强初入职场时并不顺心，他的禀赋与个性确实也不太适合当前中学的氛围。我理解他的苦闷彷徨，但除了鼓励他继续深造外也别无良策。不出所料，吴强不顾家人的轮番劝阻，毅然重返珞珈山，攻读世界史的博士学位。他以超越常人的勤奋与超越常规的速度提前高质量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其间，我们保持频繁的交流，也都想过他学成归来加盟母校的前景，希望余生能够一同灯下读史。如今我俩每次重逢，依然会聊起学习世界史的趣闻轶事，回首过往，真是百感交集。

只是造化弄人，一次机缘巧合，我开始转向从事“三农”问题的博士后研究。吴强当初对我的选择颇为讶异，但不久之后，他竟然也无师自通地走向了“三农”问题的“不归路”，并且在读博期间就发表了多篇“三农”方面的论文，博士毕业后他顺利觅得山西农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的教职，实现了研究领域由世界史到“三农”问题的无缝对接。去年，他携眷南下，转会龙岩学院。龙岩是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的故乡，吴强得以在那里续写“三农”情缘。众所周知，“三农”问题曾经是显学，汇聚了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法学家的目光。得益于历史学的功底与“三农”问题的刺激，吴强开始在农史这一相对寂寥的领域努力开掘，尤其眷恋民国时期的农科学者。他爬梳史料，勾陈索引，博采众长，逐个研究，几年下来，积攒颇丰，汇聚成书也就顺理成章了。

攻读世界史期间，我研习的是幽深晦暗的西欧中世纪史，吴强则专攻美国近现代史；转向“三农”后，我主要驻足于当下的农地制度，但一直鼓励吴强关注近代农科先贤。我相信，回眸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回望近代，董时进、沈宗瀚、邹秉文、章之汶等农学家为发展中国农业学科与助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而殚精竭虑，尽管壮志未酬，但他们的世界眼光与家国情怀，他们的拳拳之心与殷殷期盼，他们的学术抱负与人生境遇，迄今依然令人动容。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农科学者，当然也或多或少存在今人所言的缺失或局限，但他们长期淡出学界的视野，委实让人唏嘘。由此观之，吴强博士的努力，更显得弥足珍贵。

吴强作为“青椒”，自然承受着多方面的重压，但他能够保持定力，勤于阅读，敏于思考，善于写作，获得了不俗的学术成果，近年来一直延续着学术高产优产的势头，此书的出版也是他阶段性的成果小结。在此也衷心祝愿吴强能以此为契机，在“三农”领域大显身手！

余永和

2018年12月1日于天津

前 言

本书从构思立意到动笔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意味着自己年岁渐长，从青年博士到为人父母，而且也是本人学术道路和研究方向不断实现转进的产物。

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母双亲也都是本分淳朴的“刨食者”，真是“粒粒皆辛苦”！然而，由于在踏入学术之门后一段时间内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世界史，故也不太可能“脚踩两只船”，只能一心一意于本专业的学习，这也是世界史学科本身难度（一般来说，既古又洋，对研究者的外语水平和理论功底有着极高要求）所决定，虽然自己一直对近现代史非常感兴趣，也看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直至真正入读博士之后的第三年，受到来自好友余永和教授现身说法的影响，并出于对未来前途的实际考量以及对博士能够按时毕业的起码自信，遂决定尽快转向中国史，并以中国近现代农史作为切入点，特别是将留美农科学人作品及其思想的搜集、整理、挖掘作为重中之重。以此思路为指导，加之武汉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藏，我在攻博的最后两年集中阅读了三大本沈宗瀚口述自传（台湾原版）和著名学者钱理群所撰其尊人钱天鹤的有关忆述文章，对他们两位的有关思想作了详细梳理，并整理成文，这当是本书最初的“模子”。

博士毕业之后，我有幸来到地处太谷的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在完成思政课教学之余，全力投入曾于该校工作过的“老金陵”——主要是王绶和乔启明这两位著名农科学人论著及其思想的研究

究，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楔入以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农科学人为聚焦的农学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毕竟，民国时期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乃是当年留美农科学人回国之后的大本营，前述沈宗瀚、钱天鹤也都曾在此任教多年，并于做出骄人业绩之后才转向农政管理部门。如是选择既是本人一定时期之内问题意识自然延伸的反映，也非常符合笔者所在单位以农为特色的办学宗旨，邹秉文、章之汶等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入我的学术视线。至于董时进，除了媒体热捧之外，对其所作的研究同样也是受到余永和教授的启发和点拨，记得当时还利用有关数据库下载了不少董氏论著，并以编纂出版其文集自期，而董时进本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乃民国时期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刚好与沈、钱、王、邹主要从事的自然农学构成一个完整的农科拼图。

笔者从事中国近现代农史研究，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误打误撞”，但也可以说是各方面机缘黏合在一起的结果，对近代中国农科学人的兴趣不仅是过去数年持续耕耘的对象之一，也将是未来继续深化开拓的对象，此书也算为本研究开了个头，期待更为精彩的将来。

目 录

上编 思想史个案

| | |
|----------------------|----|
| 第一章 钱天鹤农业思想概说 | 3 |
| 一、兼收并蓄、引入现代科技发展蚕丝业 | 4 |
| 二、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 7 |
| 三、流落宝岛、助力农工 | 10 |
| 四、经验与启示 | 11 |
| 第二章 沈宗瀚农业思想管窥 | 14 |
| 一、负笈留美奠定思想基调 | 15 |
| 二、农业发展的关键在增产 | 17 |
| 三、沈宗瀚与梁漱溟、晏阳初的分歧 | 19 |
| 四、探索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之道 | 21 |
| 第三章 邹秉文的中国农业发展方略述评 | 24 |
| 一、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 | 26 |
| 二、农业建设的邹氏方案 | 28 |
| 三、高度重视农业教育 | 33 |
| 四、余论 | 38 |

| | |
|---------------------------|----|
| 第四章 王绶的中国农业研究及其开创意义 | 39 |
| 一、生平事略和学术历程 | 40 |
| 二、矢志振兴大豆，科学改良为关键 | 46 |
| 三、寻求人地协调，粮食增产是目标 | 53 |
| 四、提倡教研一体，擘画学科发展方向 | 58 |
| 五、王绶的学术贡献及其当下价值 | 61 |

下编 教育史探研

| | |
|---------------------------|----|
| 第五章 章之汶农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探究 | 67 |
| 一、以农为“志业” | 68 |
| 二、准确、全面理解农业教育的本质 | 69 |
| 三、执掌金大农学院时期的农业教育实践 | 73 |
| 四、结论 | 77 |

| | |
|-------------------------|----|
| 第六章 董时进高等农业教育思想探究 | 79 |
| 一、以造就人才为根本宗旨 | 80 |
| 二、教、学、做三结合 | 83 |
| 三、办学应直接面向农村和农民 | 87 |
| 四、意义与启示 | 90 |

| | |
|-------------------------------|-----|
| 第七章 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水准透视 | |
| ——以王绶和金大农学院抗战时期的三份学程表为例 | 91 |
| 一、三份学程表的主要内容评述 | 92 |
| 二、三份学程表背后的人物悲欢 | 98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王绶 | 101 |

补 编

| | |
|---------------------------------|-----|
| 第八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评估····· | 107 |
| 一、农业生产环境和边区政府的农村政策····· | 109 |
| 二、农民的开门七件事····· | 114 |
| 三、与国统区农民生活的横向比较····· | 117 |
| 第九章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研究····· | 121 |
| 一、雷德菲尔德其人····· | 123 |
| 二、方法论基础：功能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经验社会学的融合····· | 124 |
| 三、重新界定农村社会与农民群体····· | 129 |
| 四、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的划分与相互涵化····· | 132 |
| 五、小结····· | 135 |
| 主要参考文献····· | 138 |
| 后记····· | 143 |

上编 思想史个案

第一章 钱天鹤农业思想概说

钱天鹤，农学家、现代农业科学的先驱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主要创始人。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农业行政工作，对发展大后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生产有重要贡献。台湾光复后，置身台湾，参与农业政策和实施纲要的制定，对恢复和发展台湾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投身金门、马祖两岛的农业建设，成绩卓著，甚受两岛人民的爱戴。^①

以人物传记的标准来衡量，上述文字对钱天鹤的生平勾勒已经较为清晰，读者当能从中大致了解到传主本人的一生行谊。若将钱天鹤置于中国近代农学史这一学术系谱传承后，便发现文字背后所蕴含的丰厚思想遗产远未得到深入挖掘。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钱天鹤可谓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其在农业诸多领域皆有不凡造诣，闪烁着作为一位杰出农学家的思想光芒。然而，由于时代原因，以及钱天鹤本人并未留下个人回忆录，且后期逐渐转向农业行政工作的缘故，相比于蒋梦麟、沈宗瀚这两位已出版回忆录的农复会创始成员，钱天鹤之于学界和民间都显得陌生许多。有鉴于此，本章试以《钱天鹤文集》（简称《文集》）为讨论文本，对其农业思想作一概说。

^①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综合卷1），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一、兼收并蓄、引入现代科技发展蚕丝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绢丝织物的国家，这是全世界各国早已公认的事实。”^① 蚕丝相传系由黄帝元配嫫祖发明，《皇图要览》《通鉴外纪》《孝经》《史记》和《淮南子》等中国古代众多文献中都有关于如何养蚕和缫丝的详细记载，代表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② 以蚕丝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丝织业也成为中国古代自给自足式农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著名唱词——“你耕田来我织布”便是这一生产生活方式的生动写照。可以说，蚕丝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已成为中国古代手工业体系中较为成熟的行业，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经验。

林语堂曾戏称自己的一生是在中西两种文化间“脚踩两只船”，这一形象说法也可用来说明近代中国较早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那批海归学人的普遍心态，毕业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后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学硕士学位的钱天鹤也不例外。翻检整部《文集》，以蚕学研究见长的钱天鹤在立论时，一方面大声疾呼借鉴国外先进养蚕技术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始终不忘对本国既有经验的批判性总结。钱天鹤认为：“我国自古为产丝名国。汉代绢棉流入罗马，直与黄金同价，遐迩人士，无不想望我中华凤物，竟以丝国见名。盖我国蚕业之独享盛名，来由久矣。”^③

换言之，面对西方国家蚕丝制品的激烈竞争，国人虽无绝对优势，

^① 中国科学院蚕业科学研究所、周匡明主编：《中国蚕业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② 华德公编著：《中国蚕桑书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综合卷1），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在《机器孵卵》和《中国固有之机器孵卵》两文中，钱天鹤首先认可了科学昌明之于西方农业发展的作用，但其后即指出中国古代农民往往也善于利用各种方法来达到与现代机器作业类似的效果。在另一篇题为《论蚕忌》的文章中，钱天鹤并未如大多数人那样将载于中国古书中的“蚕忌”一概斥为迷信，“不敢深信”，而是主张以现代科学试验来判断“蚕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效力，不以流传为据，而以事实为准。为此，钱天鹤组织了金陵大学蚕科同学对《务本新书》中所提及的“蚕忌”逐条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这些古老智慧的结晶虽有失偏颇之处，但其对养蚕时温度、湿度和周边环境的强调也完全适用于现代。《讲农古籍汇录》一文则更是钱天鹤对中国农史高度重视的显例，此文刊布了三大类（花草、果蔬和杂类）共计 75 种古农书。

钱天鹤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未盲目自得于中国古代蚕桑传统，而是清醒而理性地看待近代以来中国蚕丝业的发展状况及其与他国之间存在的差距。钱天鹤在《文集》的多篇文章中运用了各类统计图表，以告诉读者中国丝织业的真实境况。发表于 1919 年《科学》杂志上的《中国蚕丝业之研究》一文详细列数了 1917 年中国各省蚕丝价值。根据该文相关图表数据，当年全国蚕丝产值为 1.39 亿元，仅浙江一省就几居全国之半（54 492 050 元），同一年的中国蚕丝出口为 7 900 余万元，而日本的蚕丝出口多达 370 000 000 万元，相当于中国的 5 倍。^① 在另一篇《振兴蚕丝业之管见》中，钱天鹤引述国外学者的数据说明民国初年（1913 年）日本蚕丝占据国际市场的份额已近一半（44.5%），而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中的比例则降至 25.9%，中国蚕丝业事实上已被日本甩开相当距离。^② 出于对国外蚕丝业的关注，钱天鹤另将日本学者石明弘所写的有关法国和意大利两国蚕丝业发展的专文译为中文（《法意两

^① 钱天鹤：《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36 页。

^② 钱天鹤：《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5 页。

国蚕丝业之概况》),以飨国内同好,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国外蚕丝业先进理念在中国的传播,钱天鹤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桥梁”的角色。

曾经辉煌的中国蚕丝业时至钱天鹤撰写蚕学论文时为何会衰弱?既然现况已今不如昔,又如何改善和追赶?对于这些难题,钱天鹤也有一整套看法。他认为以下这些原因导致中国蚕丝业大不如前。

其一,蚕病之蔓延与农民墨守旧规。当时虽已有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发明框制蚕种术,但一来中国幅员太广,蚕农还是以古时经验为准,不知也无力使用现代科技应对蚕病,这使得中国农村的家庭养蚕很难抵御病害,风险较高。

其二,养蚕法之不合。“我国乡民识字无多,养蚕之法都由口授,及本其一已经经验之所得,展转流传,谬误滋多,即讲蚕古书,其中所述,亦多费解及迷信之谈。”^①蚕农养蚕法之所以不合,很大程度上还是和他们靠经验吃饭有关。

其三,厂经之粗细不匀而多胶结,不合英美织绸家之用。“我国缫丝之法,创自太古,数千年来进步殊鲜”^②,其根源还是在于中国蚕丝业的科技水平不高,产品难以适应国际市场需要。

其四,金融机关不完备。如果说以上诸条还更多地是从技术层面入手的话,钱天鹤特意提及金融机关的不完备则表明他已经注意到社会因素对中国蚕丝业的制约,蚕农和丝商的资金来源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其五,政府之漠视。钱天鹤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后妃每年3月亲桑之典,但多流于形式而并未真正起到实效,“奈徒托虚文,无补实事”^③。清末民初,浙江、湖北、四川、江苏等地纷纷兴办蚕校,但因主事者不仅没有发展蚕桑的决心和恒心,也常视之为累赘而未能给予有力资金支持。

① 钱天鹤:《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② 钱天鹤:《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③ 钱天鹤:《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针对上述问题，钱天鹤提出系统解决方案：①检定蚕卵；②推广桑园；③防止茧商操纵茧价；④由政府或公共团体筹资创设茧行及丝厂于蚕业素未发达的地区，以补助蚕户；⑤提倡国际直接贸易，派人调查国外丝业情形；⑥政府和银行对蚕丝业的金融支持；⑦改良厂经及设立生丝检查所；⑧振兴蚕业教育；⑨派遣学生留学日、法、意三国；⑩书报杂志统计等刊行；⑪蚕业家之互相联络。钱天鹤对如何振兴蚕丝业所提的这些意见不仅涵盖了生产和销售，而且还综涉病虫害防治、规模生产、国际贸易、金融扶持、政府政策、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项，其对于发展蚕丝业的论述可谓巨细靡遗。

二、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国民党政府对其经济领导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① 迁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1月1日根据颁布的《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将原有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全部划归经济部。翁文灏出任部长，钱天鹤则担任该部下辖的农业司长。这一职务也标志着钱天鹤人生旅程第二阶段的开始——由一位学有专长的农学家转为中央层级的农业行政主管官员。1940年7月，钱天鹤就任新设置的农林部常务次长一职直至1947年6月卸任。由于这一时期担任农林部长的陈济棠等人为行伍出身，身为常务次长的钱天鹤负有更多责任为战时中国农业发展及战后复员而殚精竭虑，这也给了钱天鹤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机会，《文集》中因此留下不少这方面的思考。

作为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海归学者，钱天鹤的观照视野较为开阔，

^① 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253页。